

蒋子龙 小说欣赏



JIANGZILONG
XIAOSHUO
XINSHANG

广西教育出版社

蒋子龙小说欣赏

夏康达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蒋子龙小说欣赏

夏康达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28 9 $\frac{4}{28}$ 印张 169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435—0504—5/I·35

定价：3.15元

内 容 提 要

有位评论家曾说：“仅就工业题材而言，我以为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正说明蒋子龙是以反放工业题材的作品而蜚声中国文坛的。他熟悉工厂生活，又能以一个工业企业家的眼光透视工业的各个方面，而且善于把工厂的现实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进而把创作视野扩展到整个全景社会。本书作者对蒋子龙素有研究，精当地概括了蒋子龙创作中所渗透的忧患意识和他所塑造的崇高形象及其悲剧美；刻画人物注重强者性格和表现他们的人格美；艺术描写突出真材实料，追求具有力度的奇崛美。本书选篇精粹，每篇的赏析既紧扣作家的总体特色，又细致地分析具体特点，使本书既有赏析性，又有学术性，读后对新时期工业题材和改革题材文学的特点有所了解。

五洲图书公司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序

姚 雪 垠

我国现代文学开始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历史要求下诞生的，因而它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一开始就同人民的命运联系密切。在“五四”时期重点介绍近代西洋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和理论，又介绍世界弱小民族文学，就是出于我国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在我国虽然也有过如创造社这样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提倡浪漫主义，各种流派也曾竞相争鸣，致使文苑百花竞发，但是新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几十年来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这就是“五四”文学的革命传统。后来随着革命不断发展，对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不断提高，但是直到今天，我国的文学仍然是发扬和发展这一传统，而不是忽视——更不是背离这一传统。如今使青年人了解新文学的“五四”传统，认识几十年来新文学所走过的战斗的光辉道路，十分必要。现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约请一些大学现代文学的

教师和文研单位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共同撰写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从今年开始陆续出版。可以帮助青年读者大体上认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丰富收获和光辉传统。

现代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文学方面却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先进就先进在她的文学不是颓废的、黄色的、空虚而无聊的、贩卖低级趣味的，而是一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为着现实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我们已经产生了如鲁迅、茅盾、郭沫若这样的伟大作家，还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和优秀的作家。我相信，由于打倒了“四人帮”，思想和文学得到解放，今后若干年中必将继续产生更多的伟大和杰出的作品和作家。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道路必须善于继承和发扬我国三千年的，尤其是“五四”以来的光辉传统，同时还要认真纠正我们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这样才能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于北京

编 辑 例 言

一、《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旨在研究“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艺术风格。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我国文学史的新时期，出现了群星灿烂，百花竞发的局面，不论在思想和艺术上均有前所未有的成就。本丛书主要通过对作家具体作品的集中赏析，显现作家的艺术灵魂；汇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风貌，从而帮助我国大、中学生及文学爱好者扩大文学知识视域，提高文艺鉴赏能力，丰富精神生活，并促进当前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二、《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以鉴赏为审美主要手段，并辅以评论专文和年表。欣赏文章力求结合文学史、作家创作道路及其美学思想，准确而精细地剖析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评论专文要求较全面地综论作家和创作风格，评述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年表则扼要地反映作家生活和创作情况；三者结合，形成有机整体，以映现某一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

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主要选择能够体现某一作家艺术风格和特色的代表作。一般以短篇为主，中、长篇和多幕剧则节选。同时根据不同作家的具体情况，或侧重某种文体，或以一种体裁为主兼顾其

他。本丛书将依据具体情况出一位作家的专辑或几个作家的合辑。为方便读者均刊有原作。

四、《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求撰写者立论鲜明，各抒己见，言之成理，不落俗套。具体写法，不拘一格，文字力求清新活泼，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五、《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原属广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业务。文教编辑室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示扩建为广西教育出版社。因此，本丛书的编务和出版今后将由广西教育出版社负责。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7. 7. 15

目 录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序·····	姚雪垠
编辑例言	
蒋子龙的小说艺术·····	(1)
乔厂长上任记·····	(19)
新的主题 新的人物·····	(69)
——读《乔厂长上任记》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79)
一个被扭曲了的灵魂·····	(106)
——读《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赤橙黄绿青蓝紫(节选)·····	(112)
富有时代色彩的当代青年形象·····	(144)
——读《赤橙黄绿青蓝紫》	
一件离婚案·····	(151)
一篇别具特色的小说·····	(173)
——读《一件离婚案》	
拜年·····	(178)
深邃的思索 凝练的笔触·····	(204)
——读《拜年》	
锅碗瓢盆交响曲(节选)·····	(210)
在动作中写人物·····	(238)
——读《锅碗瓢盆交响曲》	
蒋子龙年表·····	(244)

蒋子龙的小说艺术

夏 康 达

从1965年6月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至今，蒋子龙涉足文坛已经二十多年。他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作家，是1976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之后，至今也有十年了。1979年7月，《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鼎盛时期。1986年4月，他向读者奉献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篇《蛇神》，显示了他的笔力至今不衰。

蒋子龙用他的笔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他自己的形象。说得更确切些，不是“塑造”，而是表现。蒋子龙不是那种以表现一己的心灵为最高追求的作家，也不是那种反映客观世界时努力将自己隐蔽起来的作家。他拿起笔来，就忍不住要把自己的喜怒好恶、褒贬抑扬连同他所要反映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如决堤的洪水整个儿地在笔下倾泻。他在表现客观世界时，也顽强地表现着他的自我。因此，他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这也就形成了他的艺术特色。本文拟从蒋子龙的主体意识在其创作中的客观体现这个角度，试对蒋子龙的小说艺术略作探讨。这一探讨决非蒋子龙小说艺术的全面研究，仅就几个主要的特点发表一些看法。

忧患意识：崇高形象与悲剧美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批评界有一种意见，认为乔光朴这个形象太理想化了。“理想”本来是个好词，可是那几年的作品要是被视为“理想化”，就和“高、大、全”沾上了边，几乎成了掩盖生活矛盾和缺乏真实性的同义语。蒋子龙曾经撰文正面回答过这种批评。他的意思主要有两点：一，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很多乔厂长，还有不少比乔厂长更果断更优秀的人物。也就是说，乔厂长并非脱离生活真实凭空臆造的形象；二，他在写乔光朴时，的确加进了一些理想的成分，也可以说是给他涂上了作者的理想和感情的色彩。所以，“乔光朴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关于〈乔厂长上任记〉的通讯》，见《不惑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既然生活中还有比乔光朴更优秀的厂长，那末，为什么说这个人物又是“理想的”呢？我想，这种理想色彩，主要不是表现于对人物品格的美化，而在于人物命运的安排。蒋子龙在上面引述的那篇文章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有的同志对我说，现实生活中有乔厂长这样的人，但结局不会这么好，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是悲剧。也许这是对的。但象乔光朴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都是悲剧结局的话，那我们实现建设新生活的大业很可能也是一场悲剧。我也正是想通过小说提醒读者警惕这种可能，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蒋子龙不愿生活中出现这样的悲剧，这就是他的愿望，他的理想，但他又担心真的出现这样的悲剧，所以要提醒读者警惕

这种可能。我们深深地感到了蒋子龙复杂的思绪。所以，《乔厂长上任记》和它的续篇《“维持会长”》都有一个颇为暧昧的结尾。前者结束时乔光朴唱了一句《铡美案》：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包公唱这句唱词时，好戏还刚刚开场。这个结尾意味着乔光朴的困难还在后头。后者结尾时，乔光朴已经面临着被罢官的命运。最后如何，不得而知。“有人说《乔厂长上任记》似乎没有完，没有结尾。我觉得生活没有结尾，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我们国家的新体制刚刚开始建设，我很难给小说加上结尾，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不惑文谈·〈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蒋子龙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人物的命运。小说的结构是完整的，不缺结尾。只是在小说结束时，没有给人物以大功告成的胜利结局，甚至未能达到接近胜利的境界，实际上已经离悲剧不远了。读了《“维持会长”》之后，不知道原先批评《乔厂长上任记》过于理想化的同志有何感想？蒋子龙是愿意在他的作品中有点理想的光彩的，但这点“理想”也可怜得很，它根本无法遮盖住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或者说，这种忧患意识正是作家对其理想的执著追求的具体体现。

请原谅我用了“忧患意识”这个概念。因为，“忧患意识”曾被存在主义哲学认为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使用这个概念，很容易被认为是拾人牙慧。其实，“忧患”一词，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把它创造出来了，原本跟存在主义无关。有时说话也真难。比如“反思文学”的“反思”一词，显然是顾名思义，从字面理解的。但“反思”又是德文 *Nachdenken* 和英文 *reflection* 的意译，此概念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来说明人的认识活动，因而，有人认为用于“反思文学”颇不

妥。其实，此“反思”非彼“反思”，何必硬拉在一起。我们过去习惯于遇到国外一个什么新事物，便力图证明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现在似乎又有人热衷于证明我国出现的新事物在国外也“古已有之”。不注重新思想、新事物对现实世界所产生的实际意义的客观评价，而将精力用于考证其是否“古已有之”，这样的研究当然也是一种学问，但有多少现实意义，我是很怀疑的。为此，我先要申明，此处讲的“忧患意识”并不是从存在主义那里搬来的。我对存在主义所知甚少，如果竟然有些地方不约而同，那也纯属巧合。我所说的“忧患意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内涵。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民族曾经创造和享有过世界最高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可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却未能跻身于当代世界文明的前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了令人羡慕的社会主义制度，可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却还不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尽管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但面对着眼前的现实，我们能毫无忧患？这种忧患意识，正是构成当前我们民族的复杂心理的一个重要的因子。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死死纠缠着蒋子龙，以至缠住了他的理想的翅膀，使之不能尽情高飞，永远依恋着现实的大地。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背上。”——这是《乔厂长上任记》开头所引述的乔光朴的话。这段题记式的引语，正面交代了作品的题旨，也直言不讳地倾诉了作家的忧患。这篇小说着眼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从管理的角度反映了工业战线的深刻矛盾；《悲剧比没有剧要好》（1985年5月发表）从

人生哲理的角度表现企业家如何面对命运的挑战；《阴错阳差》（1985年6月发表）则从民族文化心理构成来探寻改革所面临的障碍。作家的探索层层深入，他的忧患意识犹如细密的神经对生活作出灵敏的反应，同时又渗透在作品之中，撩拨着读者的灵敏的神经。

这种忧患意识显然影响了蒋子龙创作的审美意识。他难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那种统一、平衡、和谐的优美境界，他的气质使他必然靠拢美的崇高境界。他并不创作一般意义上讲的悲剧性作品，但，从美学范畴的意义上说，蒋子龙的小说大多具有悲剧色彩。1982年以后，他几乎连续写了三个在标题中带有“悲”字的中篇——《九大行星的悲剧》、《悲剧比没有剧要好》、《燕赵悲歌》，后两个都是反映现实题材的。《悲剧比没有剧要好》的标题，是作家推崇的一种人生哲理，也不妨把它看作作家的美学追求的宣言。

社会意识中的忧患感和审美意识中的崇高特性相结合，决定了蒋子龙小说创作具有以下特点：

一，创作题材多涉及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先看几个统计数字。1983年10月出版的《蒋子龙选集》共收中篇小说九篇，除了《螺旋》和《九大行星的悲剧》，都是反映当时现实的。此后到1985年底，又发表了《悲剧比没有剧要好》、《燕赵悲歌》、《阴错阳差》三个中篇，也都是反映当前现实的。蒋子龙在全国性的中短篇小说评奖中，共有六个作品获奖，全是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还有一个事实：1984年，他放下已经开头的长篇，到一个引起各种议论的村子去深入生活，赶写了《燕赵悲歌》，涉及农村改革中的不少敏感问题，可见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程度。最近有人撰文，将中

国当代小说创作分成七个流派，蒋子龙被归入“社会问题派”。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派”存在的话，把蒋子龙划进去是符合他的创作实际的。过去从政治着眼，把题材看作决定作品价值的主要准绳，搞了一个什么“题材决定论”，显然是很荒唐的。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题材对他的创作不会有什么决定性意义，尤其是对作品的思想深度不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从作家的艺术风格来看，情况就不一样了，题材对作品所体现的美的形态是会产生直接影响的。蒋子龙说过，出于一种责任心和紧迫感，他不能旁观生活，虽然老想反映现实，因而带来一系列问题和困难，他也曾经动摇和害怕，想避开一些尖锐的现实问题，但由于紧迫感和责任心，他坚持这么做了（见《不惑文谈·写给厂长同志们》）。这正是他的忧患意识在起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现实中的重大矛盾，必然伴随着艰巨斗争，就更能成为具有崇高特性的表现对象。这样的选材特点，也是和蒋子龙的审美意识相吻合的。它带来了强烈的审美效果：作品以其宏大的气势震撼读者的心灵。

二，小说情节多由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构筑。蒋子龙的小说常常把人物置于剑拔弩张的斗争态势中。作品开头便展现一种山雨欲来的氛围，主人公一出场便卷入矛盾漩涡之中。我们再搞一个不完全统计。蒋子龙有好几篇小说是从人物上任做文章的。《乔厂长上任记》不必说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写的是金厂长上任，《赤橙黄绿青蓝紫》是解净到汽车队上任，《锅碗瓢盆交响曲》是牛宏到饭店上任，《阴错阳差》虽不写上任，但布天雱、马弟元出国回来，也好比重新上任，不过这个“上任”实质上意味着卸任，还有《弧光》、

《拜年》、《悲剧比没有剧要好》等，都涉及由谁“上任”的问题。从“上任”展开故事，正是便于将各种矛盾集中起来，同时爆发，形成剧烈冲突。由此可见，蒋子龙在构思情节时，不仅不回避、而且敢于触及矛盾，激化冲突。矛盾愈尖锐复杂，就愈难收场。蒋子龙当然也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赤橙黄绿青蓝紫》从作品的矛盾性质和艺术格调考虑，不得不安排一个较圆满的结局，但刘思佳与解净的矛盾一旦展开就很难让谁服了谁，最后不得不借助一场大火来完成几个主要人物的刻画。有人批评这个情节落于俗套，此说颇中肯綮。但通过大火，解净以其在行动中展现的人格力量终于使刘思佳折服，致使他们之间尖锐冲突的缓解获得了尚能让人首肯的契机，这就不失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更多的情况下，蒋子龙并不追求这种圆满。在两种社会力量的尖锐斗争中，他的作品明显地流露着对正义力量在感情和道义上的支持，但决不人为地缓解冲突使之获得廉价的胜利。《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维持会长”》、《开拓者》、《悲剧比没有剧要好》、《燕赵悲歌》、《阴错阳差》等，都不因忧虑不能收场而不敢让矛盾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予以集中的展示，而以正义力量仍未摆脱困境的结局，吟诵了一曲曲壮怀激烈的慷慨悲歌，使作品呈现撼人心魄的悲剧美。

三，小说的主人公多由“英雄型”人物担当。所谓“英雄型”人物，与通常说的英雄人物、新人形象不是一个概念，内涵要更宽泛些。有些不一定能称为英雄的所谓强者、开拓者，都在本文说的“英雄型”人物的范围内。他们有雄心，有胆识，有魄力，有作为，在文学创作的人物画廊中，与所谓“小人物”、“多余人”形

成对比鲜明的审美特征。被评论家称为“开拓者家族”的系列形象，就是蒋子龙笔下“英雄型”人物的核心部分。“英雄型”人物的成功塑造，是作品的审美形式具有崇高性质的重要因素。英雄崇拜是我国传统的审美心理之一，“英雄型”人物从来在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对英雄人物作“神化”的刻画，也未尝不是传统艺术中的一种审美情趣。至于“四人帮”鼓吹的“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高、大、全”，则是另一性质的问题。抛开政治不谈，把对“英雄”（当然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神化变成绝对的模式，在艺术上也是走上了绝路。这几年人们审美心理中的非神化趋向固然反映了审美趣味的发展变化，此外，也不无某种逆反心理在起作用。这种非神化趋向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发扬现实主义精神）不无裨益，但随之出现的非英雄化趋向，却未必全是有益无害的。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的时代，而改革的时代是需要英雄和巨人的。作为改革时代的文学，怎能排斥塑造英雄形象？从审美意识讲，文学创作要达到壮美和崇高的境界，也难以离开英雄（或说得宽泛些，叫做“英雄型”）人物的塑造。1979年，正当“伤痕文学”方兴未艾之时，蒋子龙笔下走出了乔光朴这个人物。他顶着社会上对塑造英雄人物所抱有的逆反心理，刻画了新时期小说中第一个“四化”建设的英雄形象。在艺术上，这个人物是以豪放坚毅的英雄气质所体现的崇高的壮美来征服读者的。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一个安逸的职务而去承担一个有风险的重任，从中体现了一种牺牲精神，也使读者感受到了悲壮的情绪。这种悲壮感几乎贯串在蒋子龙笔下的全部“英雄型”人物身上。他们的先进意识面对着各种社会阻力，常常